



为 改 革 声 辩

- “京城四少”与“京城四老”
- 我出身贫寒之家，上大学吃不饱饭
- “西北王”何炼成的硕士生，人民大学卫兴华的博士生
- 我曾任人民大学经济学系系主任，之所以离开人民大学
实际上有两大原因
- 很早就有人讲我搞私有化，导火线有两条
- 当前中国经济学界存在不同的学派，我是属于……
- 最能代表我学术成就和经济思想的著作

这是中国经济出版社编辑毛增余采访我的录音整理稿，时间是 1998 年 12 月 28 日。本书将之权作为序。

问：魏教授，您在我国经济学界被誉为“京城四少”之一，请问，您自己是否接受这一称号？这一称号最初是由谁发明的？为什么把你们四位经济学家联系在一起？你们平时是否联系得很紧密？

答：“京城四少”这个词我现在也不知道是谁发明的，我都不知道是谁先提出来的，我是在香港报纸看到的。我有一次看到一家香港报纸写所谓“京城四少”，它的含义就是中国年轻的经济学家里边有四位，同称“京城四少”，当时还提到“京城四老”。因为当时正在演一个电视连续剧，叫《京城四少》，所以有人也认为经济学界也有一个“京城四少”。我估计“京城四少”的含义不是贬义，是褒义，是褒义词，也就是讲北京城里有四位经济学家比较活跃，思想比较活跃，可能知名度较高的这么四个人，所以同称为“京城四少”。但到底是谁发明的，谁先讲的，我不知道。

国内有人讲是萧灼基教授先讲的，但我是在香港报纸看到的，叫起来后在大陆叫得比较多，在香港也较多。你看最近《参考消息》登篇文章，是讲钟朋荣的（指 1998 年 11 月 14 日《参考消息》第 8 版的一篇文章，《网络经济时代迅猛向我们走来——著名经济学家钟朋荣谈“中国 CITY 网”的发展》，编者注），就讲钟朋荣是“京城四少”之一的资深经济学家，这显然不是我们大陆，而是从香港转载过来的，我估计是从香港先炒作

起来的，后来大陆也有人讲，大家也就接受了它。我的理解这是个褒义词而不是贬义词，所以，这个称号好像是一种客观的（评价），你也无法评价这种事情，你接受还是不接受，对你来讲已经无所谓了，它完全是客观的评价，所以这种客观的评价我不能说我不接受，也不能说我接受，很难说清楚这个事。

至于为什么把我们四位连在一起，我想恐怕主要有两个理由，我自己猜测，一个理由是我们的学术倾向比较相似，我们的整个学术倾向属于改革倾向，整个思想倾向改革，这恐怕是原因之一；第二是当时我们四个比较活跃，在新闻界传媒中比较活跃，应该讲很活跃，所以这样一来，可能有人思想深度很深，为什么没把他叫成“京城四少”之一呢？可能他的活跃程度不够，我们这四个人被当时的新闻界“炒”得比较厉害，比较活跃，所以最后被叫成“京城四少”。估计是这两条理由，一个是学术思想的倾向基本一致，就是改革性比较强，改革倾向比较强；另外一个就是当时确实我们比较活跃。除此之外，我们四位联系也比较多一点，共同出席一些会议，或者共同去搞一些东西，参加一些咨询活动，联系还是比较紧密。

问：你们四人是不是共同出过一些东西？

答：共同写书没有写过，但是有些丛书都参加，可能找了一个四个都参加，有时出的一些文集，比如最近出的《中国新一代思想家自白》，那里面就是“京城四少”都有，它要求四少都写，然后还有香港出的《中南海新智囊》这本书，就把“京城四少”排在一起，我们实际上除了平时联系一点之外，没有一起写过东西，但对某一件事我们会一起谈看法，比如河南的“济源现象”、

“珠江三角洲的问题”，报纸上经常出现我们四个同时谈一个问题。但是平时在一起写书好像还没有完全到这一步。

我对这个称号的看法就是客观的东西你无法评价，大家愿意承认你就承认你，无所谓，叫就叫了，你说我是也就是，我从来没有为此事争论过，我为什么承认它呢？因为我觉得起这个称号的人主观意愿是好的，他不是想贬低一些人，主要是想给中国划个学派，什么“京城四老”、“京城四少”都有。

问：什么是“京城四老”？“京城四老”是指谁？

答：“京城四老”是指董辅弼、厉以宁、刘国光，还有吴敬琏，经常把这四个人联系在一起，联系得比较多，后来我发现虽然这四个人学术倾向可能并不一定一样，但是，他们都比较活跃。所以我想老有一些人主要是新闻界一些人为了造就新闻轰动起一点这类名字。为什么叫“京城四少”？刚演的电视连续剧就叫《京城四少》，所以就用这种符号扣在这四个人头上。我想这是为了造就一种活泼性，学派的划分是为了造就活泼性，所以采取这个办法。我想是这样的。

问：能不能请您谈一谈您的求学经历？

答：关于我的求学经历，有的记者写了一篇报道，我这里没有，他写我是“有心栽花花不成，无心插柳柳成行”，这个概括我后来从事经济学很对。对在什么地方呢？原来我没有想到我要学经济学，没有任何目标专搞这个。

我是 1972 年上的西安一个学校叫西安师专，西安师范专科

学校。当时上西安师专我的心态就是想学一门手艺、一门本事，因为那个时候的状况，我们这种出身于贫寒之家的人没什么靠山，所以老想自己学一门本事，这门本事就是到什么地方都用得着，是一套真本事，所以当时我想上物理科、数学科、化学科。在我的感觉里好像自然科学是铁饭碗，我想要有一门手艺，所以我记得当时报名时我想学数学科，但没想到进去后把我换到政教科，就是政治教育科。当时我心情非常不好，因为我上学去时所带的书籍都是我过去学的与数理化相关的书，一下把我分到政教科，我当时心情非常不好，而且多次找军代表，要求换。我学什么政治啊？不都是语录吗？学毛主席语录、马克思语录，那有什么好学的？我当时对这些东西比较反感，所以情绪很大。但军代表跟我解释，之所以把我分到政教科，原因有两条，一条是我出身比较贫寒，出身好；另外一个就是我原来在学校里好多次都是三好学生，个人品德比较好，所以我就有权上这个政教科，一般人还没资格上。军代表死活不给我调，最后我只好硬着头皮上政教科。

但上了一段时间发现，政教科学的不是毛主席语录，是政治经济学、哲学，这两门学科吸引了我，这些东西我以前没接触过，觉得挺深奥的，还真是学问。所以这个时候才开始喜欢所谓经济学，才开始学经济学。但那个时候学的实际上是从 ABC 开始的，是刚刚开始，但很快经济学就吸引了我，主要原因是当时我们国家很穷，1972 年的时候“左”的东西很盛行，很穷，对我来讲，我的一个直接的想法就是吃不饱。当时我上学时给我一个月的定量是 34 斤，34 斤定量里面有 60% 是杂粮。什么叫杂粮？就是包谷、红薯，只有 40% 是大米和面粉。我当时已经是一米八二的个子，根本不够吃。而且当时我们学生每个月的伙食

是 8 块钱，饭怎么吃呢？就是 8 个人一桌，给饭，国家给每个人一个月 34 斤粮，8 块钱（菜金），我们 8 个人坐在一起吃饭，我们自己分。根本不够吃，菜、肉都很少，很紧缺，根本不可能有，所以光靠 34 斤粮食根本不够吃，当时饿肚子，所以我老考虑一个问题，中国为什么老喊很好，却老吃不饱？这个时候学经济学才思考一些问题，我发现它和我周围的事情连在一起了。

所以我开始学政治经济学是偶然现象，是一种拉郎配的方式让我学政教，学政教一学上发现有经济学，经济学不是我想象的语录这些东西，而是真有学问，这些东西又是我平时所困惑的东西，有时会有一些解答，当时中国经济一团糟，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这个时候才开始学经济学。

所以我的求学之路不是像有些人那样一开始就很明白要学经济学的，我倒不是。后来发现学了经济学可以救国，经济学能告诉我们济世救国的道理，告诉我们让国家富强起来的道理，这样就开始学它。后来上研究生、博士生就是自觉的选择了。开始进入这个领域是不自觉的选择，进入这个领域之后成为自觉的行为。那就是因为，经济学理论能使我们思考些经济问题，同时当时经济生活很差，所以就开始学经济学。

学了经济学之后，我在师专毕业之后就留在师专，这时我在西安师专政治处工作。在政治处工作当时权力至高无上，我可以随意进入图书馆，查各种封存的书，那时好多书都被封存了，但我可以随意进，因为我的身份比较特殊，所以那时我能找到萨缪尔逊的《经济学》。那时经济学除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其他统统封杀，而我能够看到断断续续的一些东西，还有斯密的《国富论》，同时也能看到国内一些经济学家的书，像蒋学模等老先生写的东西。这个时候是完全自学，《资本论》我也看，什么都看，

因为我学了两年师专，经济学 ABC 教育刚刚完成，还没有完全进入经济学领域，所以那一段时间我是自学的。

后来 1977 年高考恢复时，我报了西北大学的经济系，那个时候我选择经济系已经有了自觉。经济系上了一年多一点，我就不想上了。这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我当时工作时间不够 5 年，不带工资，按规定工作够 5 年才能带工资，我刚好 4 年零 6 个月，不带工资，给我的奖学金只有一点点，只有 11 块钱一个月，11 块钱一个月根本不够花，吃饭也成问题，买书也没钱，生活比较艰难。四年大学怎么上？我也不能跟家里要钱了。第一个原因是生活原因，迫使我不想学。第二个原因，因为我已经学了经济学，从工作开始，一直到 1978 年的 3 月份进校，已经有了很多积累，但是教师教的都是 ABC，他是按刚入学的高中生来对待学生的，我就觉得没意思，无法满足我求知的欲望，而且有些人我觉得并不那么深刻。就在我比较困惑的时候我们学校允许在校的本科生考研究生，后来就不允许了，我那时候允许考。我在 1978 年进校后，1979 年就参加了研究生考试，报考了当时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何炼成老先生的研究生。何炼成在我们国家叫“西北王”，是西北地区最有名气的经济学家，而且应该是当时很著名的经济学家，我考上了他的硕士研究生。上研究生期间，主要是跟何先生上学，何先生这个人学术思想比较敏锐，待人非常厚道，是位宽宏大量的老师，我一辈子都永远记住这位老先生。那个时候我上他的研究生，他认为我不能光学，还要干，所以当时我就参与何先生的重要课题《价值学说史》这本书的写作，因为何炼成老先生的一个非常大的研究领域是价值问题，经济学的的一个非常大的概念是价值问题，所以就参与他《价值学说史》的写作。《价值学说史》的写作等于把整个经济学从

头搞了一遍，因为每个经济学都有价值思想。这本书我毕业时就出版了，这是我和何老师两个人搞起来的。

研究生毕业后我就留在西北大学任教，当时当何炼成院长的学术助理。当了一年左右的时间，我就深深感到一个问题，西安这个地方，尤其西北大学这个学校好像还难以满足我更高层次的研究，这个地方信息有限，处于一个不发达的地区，我的一些研究受到很大的局限，所以就想向信息比较集中而且学者如林的地方靠拢，一个是北京，一个是上海。所以当时就想上博士生，当时我记得最早是上海的蒋学模开始招博士生，北京我还不知道谁能招，后来 1984 年的时候，中国人民大学开始招生了，我就报考中国了人民大学的博士，跟卫兴华教授上博士。1987 年 10 月份毕业之后，去了日本，到了日本一所同志社大学，是日本京都的三所私立大学之一，跟一个叫笹田友三郎，还有一个筱原總一（音）两个教授当访问学者。到了 1988 年年底，一年多时间后回来就留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当副所长，后来又经济系当副主任、主任、教授。当了 5 年系主任之后，1996 年调到国资局去的。

问：听说您非常爱好文学，可以说曾是一位“文学青年”，您是如何走上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之路的？

答：我是非常喜欢文学的，但我发现文学家的形象思维能力很强。我之所以没走上文学的道路，是我的形象思维能力不行。著名作家贾平凹的形象思维能力就很强。贾平凹考研究生时与我同坐一桌。不过他考的是文学研究生，我考的是经济学研究生。因为他没学过外语，外语成绩不好，所以没被录取。

但我退休后要写小说，准备写“中国经济学的 20 年”。因为这 20 年的经济改革我都参与了。我的形象思维能力不行，但我为什么退休后要写这个，因为这个题目不是形象思维，完全是我经历的事情，带有传记性的色彩，我一定要写这个，那是后话，是以后的事情了。



魏杰在蒙古包

问：你曾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担任过系主任，并且被破格授予经济学博士生导师的资格，是什么原因促使您离开人大经济学系到国有资产管理局研究所工作的？

答：我之所以离开人民大学实际上有两大原因。一大原因是我感觉到我较长期研究国有企业，但在高校里边研究国有企业显然资料来源（不足），感觉信息不够，我一直想到一个与国有

企业接触面比较大的实践单位去，所以后来国资局找我时我同意去的原因就是刚好满足我研究上的需要。

但促使我离开人民大学更重要的原因，我的感觉是我无法实现我自己在经济学方面的抱负。什么抱负呢？我实际是终身想献身经济研究和教学的，而且我很喜欢高等院校这种环境。但是多少年来我对经济学有种看法，就是我们的经济学的教材长期没有改革，没有形成中国经济学教材，根本没有。所以，一上大学，我们上两门课，第一年学政治经济学，然后学西方经济学。这两个东西根本弄不到一起，是两张皮。中国没有一套非常完美的经济学教材，学生今天背这个，明天发现没用了。我一直对我们经济学没有教材感到很困惑。所以我当经济系主任后，就一直有个想法，就是要形成中国的经济学教材。而且一旦搞成要长期不断地完善修改，要像萨缪尔逊的《经济学》一样能在中国流传，不断地完善和改革它。我一直想做这项工作，而且我所在的人民大学在过去应该是中国经济学界的第一把交椅，应该是最优秀的经济学系。但转轨之后，要保持人民大学这种第一把交椅的位置，必须创新，而创新的突破点只能在教材上创新，形成自己的一套教学体系和教材，最后人民大学的（经济系）才能继续作为中国第一个经济系来存在，我一直有这个雄心大志，想搞《经济学》。后来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搞出来了，当时准备搞 10 本，没想到出了《经济学》（上下册）第一本后引起了一场很大的风波。

《经济学》（上下册）是想把东西方经济学拉通，打通它，要把人类更多的优秀文化成果都拿到我的《经济学》里边来，而且这本《经济学》贯穿的一条思路就是经济学研究什么呢？经济学研究稀缺资源的高效配置，这是经济学的中心研究对象。这样一来，生产关系也好，经济制度也好，还是管理也好，等等，都仅

仅是其中一部分，所以搞了个新的教材出来想打通东西方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不考虑生产关系，纯粹研究经济运行，因为它的制度已经界定好了；而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的，根本不考虑其他的，经济运行机制它不考虑，整个就没打通。所以当时我就（设法）编写一部《经济学》，而且与经济学相关的教材都要搞出来，当时定下来 10 本，但出了第一本《经济学》之后，就惹出来一个非常大的风波。有些人对此很有看法，而且从政治上把它定性为“一套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教材”，这件事还告到了国家教委，国家教委大部分人没有管、没有理睬这个事情。但既然有这么大的反响，个别人曾经找出过我这本书的高等教育出版社，找了于社长，要求停止出，说这本书有问题。于社长这个人思想很解放，他就问，你这个意见是你个人意见，还是教委意见？这个人讲得很老实，说是个人意见。那对不起，个人意见放在一边，书继续出。后来一版再版，而且越再版越漂亮，但引起了很大的风波。

当时我在人民大学我是非常希望大家来批判这本书，完善和修改它，但我不同意把它纳入“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书”，我绝不同意。后来我就讲，这本书哪里反马列主义，你给我找出来，哪怕找出来一个地方？有人说因为你这里边有西方的东西。当时我就回答，西方凡是被证明为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我都可以采用。后来我开了一次座谈会，会上有些同志使我非常伤感。伤感在什么地方？有人发言，说这本书是好的，但是魏杰当主编写的前言有问题，每个章都是好的，就是前言有问题。为什么有问题呢？前言里边讲，我们编写这本书的人都是人民大学年轻的同志，他们有优势，既在西方留学过，又对中国实践比较了解，等等。那为什么不强调他们有马列主义基础？这说明主编

倾向有问题！听到这些话当时我感到非常伤心。本来我们这些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教学改革，结果变成人与人之间的恩恩怨怨，这就没有多大意思了。开了座谈会后，效果很不理想，我一直想大家能具体提意见，比如说这一章或者这一段有问题，我非常希望大家能够把它作为一个东西拿出来，千锤百炼，最后成为一个好东西。我不反对批评，但一开始扣的帽子是“反马列主义、反社会主义的书”，这就很难再讨论下去。那么这样后面的书都有这个问题，我想施展的抱负——让人民大学经济系永远成为中国的第一把交椅的愿望就实现不了。既然实现不了，也就无所谓，没多大意义了，后来就离开了人民大学，到了国资局。

后来我还坚持把这套书出了四本。就是《经济学》第一本上下册，第二本是《现代金融制度通论》，第三本是《现代财政制度通论》，第四本是《产权与企业制度分析》，我认为经济学必须把这四本书学通，学通了就基本差不多了。经济学学了，然后财政、金融、企业这三个方面都清楚了，应该就差不多了，所以我坚持把这套书的前四本出来了。现在销量还不错，《经济学》最近又重印了。有人写过一篇评论文章，认为这是很好的书。这本书的编辑叫刘青田，是高教社的一个年青人，还有高教社的于社长，他们为这套书冒了很大的风险，我跟他们非常要好，成了好朋友。

总之，我想当时一直想让人民大学继续成为第一的地位，所以想搞这样一套书。但行不通，就感到很伤心，就离开了人民大学。应该说当时除了一直有想跟实践结合这样一个心愿之外，还有一个具体原因，就是一直想把这本书写好，但这件事给我压力非常大，大得不得了。

问：您现在还在培养博士吗？博士点是否还设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

答：我还带博士，现在还带着 4 个，博士点还在中国人民大学。以后可能转到清华来。我在国资局招的博士生，是去年招的，今年没招，在校的还有 4 个，还没毕业，还是我带。要到 2000 年以后才能毕业完。

问：除了博士生，您是否还带研究生？

答：没带研究生，硕士生我很早就不带了。只带过三届。因为我提博导比较早，1993 年成为博导，那个时候比较早，是破格的，当时只有两个，一个是我，另一个是樊纲，只有我们俩，当时还不是各个校可以自己提，国家一个委员会要批，只有我们两个人，也是最年轻的博导。

问：有人曾说过，中国的经济学家更多的是在纸上谈兵，缺乏经济的和社会的实践经验，这样既不利于经济学家自身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深入，也不利于培养高素质的经济学人才。您对我国许多著名的大企业有较深入的研究（包括长虹集团、三九集团、王朝集团和椰风集团等），既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从您自身的角度来说，经济学家投身于经济实践是利多弊少还是弊多利少？

答：关于社会实践的问题，我的看法还是利大于弊。利大于弊表现在哪里呢？你长期研究企业，你不了解企业而且走马观花

去看看企业、体验生活是不行的。好的作家都是写自己的，包括老的作家，体验是很难体验出生活来。那么必须进入社会实践，真正投入到社会实践中去，理解企业的困难和痛苦，把企业的困难和痛苦当成自己的困难和痛苦，这样才能真正地了解企业。所以我的看法绝对是利大于弊，而且应该说这几年来我的研究不断能够使得与实践结合在一起，我想恐怕与我更多地参与企业实践有关系，我不断能提出新的课题来，能一直站在前沿与这个也有很大关系。你如果光是去教书本上的东西，不到企业去，连课题都提不出来，或者你谈的东西，大家都不知道你谈什么，你谈的不是人家想了解的，那么很显然这个恐怕不行，所以我的看法还是利大于弊。

至于有些人对这个问题现在有看法，攻击这些人发财了，参加社会实践的经济学家都成了不仅是大腕而且是大款，我觉得大可不必。我一直闹不明白的一个道理就是当一些很低档的人、文化素质很低的人发财的时候我们经济学界很容忍他，但当自己的同类，就是我们中国经济学界的博士、硕士、教授等优秀人才发财时就受不了了，在他们眼里好像教授一辈子清贫才是对的。整个就是胡说八道！不能这样搞下去，这样搞下去弄得素质很低的人发了财，素质很高的人恰恰很清贫，这不太符合现代社会的要求。一直讲按劳分配、一直讲按贡献分配，到这个时候他就受不了了，受不了说明心理不平衡。你也可以去啊，谁不让你去啊？你去不了不能认为人家不对，就攻击能去的人。所以这个问题主要不是利弊问题，主要的问题还是心理不平衡。所以我觉得这是应该坚持的，这是很好的。当然要处理好主业和副业的关系。教授参加社会实践应该为教学服务、为研究服务，不能把赚钱作为第一目的，这个我觉得应该区分开来。你参加社会实践的目的不

是赚钱，可能人家给你点报酬，那是附带效应，主要还是为了经济学的研究。所以我想在这个问题上把这个关系处理好就可以了。

问：您曾在国有资产管理局工作过，您认为国资局代表国家管理国有资产行得通吗？您曾建议搞一个国有资产委员会，您能不能谈一谈国资局和国资委的区别？

您认为国资局对企业来说是又多了一个婆婆，说明您对国资局的职能有看法，而您又在国资局工作，您如何协调经济学理想和实际工作环境之间的关系呢？

答：这也是恐怕这次国资局被取消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实际上国资局代表不了国家行使这种国有资产管理。因为国资局是一个副部级单位，人家现在管国有资产的都是正部级单位，你怎么能管人家？根本管不了人家。所以我原来一直建议成立一个国有资产委员会，而且我一直认为国有资产委员会最好的方式是放在人大常委会里面，因为国有资产是全民资产，谁是代表全民利益的？就是我们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尤其是常委会，只有在那里边搞一个国资委才能脱离行政，不是国务院系统，而是人大常委会系统，代表全体老百姓管理国有资产，最好是这样。后来不行，非要搞一个副部级单位，它管不了，最后把它撤消掉了，倒不是国资局不行，主要是设计时它就是个“死胎”，如果按照行政级别去管理，它只是个副部级，怎么能去管正部级呢？冶金部管冶金系统的国有资产，它是正部级单位，国资局是副部级单位，管不了。最后呢，实际上是失败的。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我们的设置不行，国资局对企业来讲就是多了个婆婆，因为它实际

上把部门的权力拿了过来，然后搞了这么一个东西出来，等于两个部门，冶金部继续管国有资产，国资局也管冶金部管的国有资产，多了一个婆婆，应该是冶金部把权交出来，不要管国有资产，统统由国有资产管理局来管。而我们不是这种状态，所以我说多了一个婆婆，这个等会儿我可以送你一本书（指《构建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编者注），我在前言里专门讲这个问题。我一直认为中国的改革，政府的改革很对，但更多的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不改革，比如说冶金部的资产归冶金部管，内贸企业的国有资产归内贸部管，永远是改不动的，永远解决不了企业问题。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不改，政府体制也改不了，庙为什么不能拆？国有资产为什么不能改组？因为有庙，纺织工业系统的国有资产都是归纺织工业部管，你怎么能把纺织工业部撤掉呢？撤消不了。所以等一下我送你一本书你可以看看，我的看法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如果不推进的话，国有企业很难搞活，政府体制也难以改。只有把所有的国有资产归一个部门来管，所有政府的部门都不管了，庙就没有了，和尚住哪儿啊？住不了。同时企业跟政府不发生关系，就跟国资委发生关系，政企分开就解决了。而我们这一步没改好，最近又恢复到老一套来了。这还有待于看今后怎么办。

问：政府机构改革已经告一段落，国资局也撤并归入财政部了，不少读者都很关心您的近况，能不能跟广大读者谈一谈您最近的工作和经济学研究的情况？

答：国资局撤并后我已经到清华来了。之所以选择清华大学，我觉得从未来发展来看，这个地方没有框框，因为她的经济